

摇摇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明清词研究史

(~~陈水云~~ 摇摇摇)

陈水云摇摇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绪摇摇言

在 20 世纪的百年时间里，明清词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词研究论文不足百篇，研究论著几成“空白”，虽说近年来对清词的研究要好于明词，但相比唐宋词研究的高度繁荣它也只能算是“萧条冷落”^①

明清词研究所以遭受冷落，推其原因，约有三端：一是明清词的成就本来就不如唐宋词；二是明清词的文献整理工作做得不够，不如唐宋词有《全唐五代词》、《全宋词》等现存的研究文本；三是研究者的学术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自王国维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论，继之又有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张扬其说，这一观念在 20 世纪的百年时间里大行其道，现当代学者大都把他们的研究重心放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上，他们对明清词采取存而不论或论而不详的态度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们认为，明清词研究不受重视，并不是说就没有人去研究

^① 参见钟振振：《词学论考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它。其实自 1644 年明王朝建立起，人们在対唐宋词发表看法的同时，也要对当时的作者学习唐宋词的情况作一评价。有的学者通过撰写词话的方式，对明词的创作状况发表意见；有的学者则借助编辑整理明词选本的方式，向世人展示明词的创作成就。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出标志着明词的“研究”在明代即已拉开序幕。虽然清词研究历经的时间比明词要短暂些，但它的研究成果却较明词要丰富得多，究其原因，其一，是清词的创作成就要高于明词；其二，则是清人改变了对词体卑视的观念。据今人严迪昌先生的统计，在清代 268 年时间里致力于填词者多达万人，词作亦不少于 10 万首，这个数量是号称“一代之文学”的宋词所无法比拟的。^①创作的繁荣也带来了词学研究的“复兴”，在清代出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词话、词集序跋、词作评点、论词绝句，还涌现出像邹祗谟、厉鹗、王昶、郭、谭莹、陈廷焯、谢章铤等一大批以明清词批评或研究见长的学者。时间推进到 19 世纪初，故清遗老况周颐、朱祖谋为当时的明清词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况氏的《蕙风词话》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重要词学批评著作，朱氏的主要贡献在唐宋词的文献整理。他们对 19 世纪明清词研究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学界新秀，如吴梅、龙榆生、赵尊岳、叶恭绰、黄孝纾等；而王国维和胡适对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引进，又为 20 世纪的明清词研究开拓出新的思路 and 新的领域，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胡云翼、陈子展、赵景深为代表的“新派”学者。上述两种不同的治学路数和研究倾向，形成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新”、“旧”两派，为新世纪的词学研究贡献了一大批最前沿的明清词研究成果，推出了《明词汇刊》、《清名家词》、《词曲史》、《词学通论》、《中国词史略》等影响甚远的研究成果。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明清词研究分化为祖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两支研究队伍，还出现了国际化的新走向，在新加坡、北美及日本都有学者在进行明清词的研究，如叶嘉莹的清词研究、黄嫣梨的

^① 严迪昌：《老树春深更著花——清词述略》（上、下），《文史知识》

1995 年第 5 期。

清代女性词研究、孙康宜的明末清初词研究。从 缘园年代到 苑园年代，海峡两岸长期的音信断隔，造成词学研究者缺少必要的学术交流，他们对明清词的研究总体说来没有超过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但也出版了叶恭绰的《全清词钞》、饶宗颐的《清词年表》和贺光中的《论清词》、汪中的《清词金荃》等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进入 愿园年代，海峡两岸的明清词研究都取得了大丰收，不仅研究成果多，学术含量高，而且研究队伍阵营庞大，还突破了 猿园年的隔阂，进入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新境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从事明清词研究的学者，无论是祖国大陆的还是香港、台湾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以轻视的态度看待明清词，而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明清词，把它们作为千年词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阶段，这种“历史意识”的出现，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纠正了过去以个人好恶和成就高低来确定研究对象的弊端，而具有更加客观的公正性，也使得明清词这块长期不被人们看好的研究领域走进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实在是 圆园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学术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从上面描述的明清词研究状况看，对明清词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探讨明清词研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时机已经相当成熟了。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在做明清词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工作，在宏观方面有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世纪回顾与前瞻》、张兵的《清词研究二十年》、汪龙麟的《清代文学研究·清词研究》、莫立民的《圆园世纪 怨园年代清词研究概述》；在微观方面则有赵秀亭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纳兰性德研究述评》、齐敬之的《建国以来纳兰性德研究情况综述》、汪龙麟的《清代文学研究·纳兰性德研究》、赵红卫的《纳兰性德研究综述》，等等，这些成果在内容上或偏于词论，或重于创作，在时间上大都局限于近 圆园年或近百年的时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学者从更广的领域、更长的时间段来清理明清词的研究成果，这正是笔者撰写明清词研究史的初衷和出发点，即试图对明清以来的六百年间有关明清词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一方面要为读者提供大量的最原始的明清词研究文献，另一方面也想摸索出一条清晰的明清词研究的发展理路。应该

说明的是，20世纪以前的明清词研究，只能称之为“前研究状态”，它更多的是以词学批评的形态出现，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这些批评者发表的有关看法多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只有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明清词研究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的纯粹学理意味的学术研究，因此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20年是明清词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时期，我们的研究重心也将放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20年间。

最后，有必要对本书涉及的内容及范围作些交待。本书主要是以有关作家生平、作家创作、流派活动的明清词研究成果作为考察对象，以词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作为古代与现代的分水岭，而把20世纪百年时间里关于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暂时地悬置起来，这是因为在20世纪的百年里，王国维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当另书撰写，以避免挤占本书的篇幅。本书搜集材料的时间截止于2000年底，这是因为在2000年以后的五年时间里，出版了几部非常重要且学术价值颇高的明清词研究著作，若撇开这些研究成果不作任何介绍和评述，无论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从读者了解学术信息的角度都是不周全的，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就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完整地向读者介绍明清词研究的最新成果！

目摇摇录

绪言	员
第一章摇明代的研究状况 (员缘愿 员源源)	缘
摇第一节摇前期的研究 (员缘愿 员源源)	远
摇第二节摇后期的研究 (员源源 员源源)	员
摇摇一、后期词学批评的发展	员
摇摇二、陈霆、陈子龙的明词批评	猿
摇摇三、明词“名家”的研究状况	愿
第二章摇清及近代的明清词研究 (员源缘 员源源)	苑
摇第一节摇顺治康熙时期的研究 (员源缘 员源源)	苑
摇摇一、顺治时期的研究状况	愿
摇摇二、康熙时期的明词研究	猿
摇摇三、“当代”词选的编纂与清词“中兴”的思考	猿
摇摇四、清初词学论著与明清词的研究	源
摇摇五、清初“名家”及词派的研究	缘

摇第二节摇雍正乾隆时期的研究 (员圆缘- 员圆缘)	缘
摇摇一、词选的编纂	缘
摇摇二、前期的清词批评	远
摇摇三、后期的清词批评	远
摇摇四、“论词绝句”与明清词批评	苑
摇第三节摇嘉庆、道光及近代的研究 (员圆远- 员圆远)	苑
摇摇一、明词的研究	愿
摇摇二、词选的编纂与文献的整理	愿
摇摇三、关于清词的总体研究	愿
摇摇四、常州派对“当代”词的批评	怨
摇摇五、浙西派(声律派)对“当代”词的批评	员圆
摇摇六、词话、序跋及“论词绝句”中的明清词批评	员圆
摇摇七、“名家词”与“女性词”的研究	员圆
第三章摇现代的明清词研究 (员圆缘- 员圆缘)	员圆
摇第一节摇员圆缘- 员圆缘年的明清词研究	员圆
摇摇一、“清末四大家”的影响及反响	员圆
摇摇二、《人间词话》与王国维的明清词研究	员圆
摇摇三、员圆缘- 员圆缘年的明清词研究	员圆
摇第二节摇员圆缘- 员圆缘年的明清词研究	员圆
摇摇一、梁启超的清词研究	员圆
摇摇二、胡适的清词批评及词界反响	员圆
摇摇三、胡先骕对清词的评价及其清末词评论	员圆
摇摇四、朱祖谋的《清词坛点将录》及清词名家评论	员圆
摇摇五、明清词研究“新派”与“旧派”格局的基本形成	员圆
摇摇六、清初词和女性词研究	员圆
摇第三节摇员圆缘- 员圆缘年的明清词研究	员圆
摇摇一、明词的研究	员圆
摇摇二、赵尊岳的明词研究	员圆
摇摇三、清词文献的整理业绩	员圆
摇摇四、清词的总体评价及代表性观点	员圆

摇摇五、对清词中兴具体表现及其原因的分析	苑
摇摇六、清词分期的界定及词风嬗变的研究	园
摇摇七、清词流派的宏观研究与“新”、“旧”两派的学术立场	苑
摇摇八、郭则沄、柯绍忞等学者的清词评论	猿
摇摇九、明清词名家的研究	园
 第四章 当代的明清词研究 (苑- 缘 (上)	苑
摇摇第一节 苑- 苑年的明清词研究	园
摇摇一、祖国大陆 苑- 苑年的明清词研究	苑
摇摇二、我国港台 苑- 苑年的明清词研究	愿
摇摇第二节 苑- 苑年的明词研究	源
摇摇一、明词研究进入开拓期	缘
摇摇二、明词宏观研究述评	苑
摇摇三、词史的撰写与明词的研究	园
摇摇四、明代词家词作研究	苑
摇摇五、我国港台的明词研究	猿
摇摇六、北美地区的明词研究	愿
摇摇第三节 苑- 苑年的清词研究总论	园
摇摇一、清词研究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	园
摇摇二、清词研究的全面繁荣	苑
摇摇三、清词文献整理的巨大成就	愿
摇摇四、关于清词与宋词总体比较的研究	猿
摇摇五、关于清词“中兴”及其原因的分析	源
摇摇六、清词史的研究与严迪昌的《清词史》	苑
摇摇七、清词宏观研究的几个重要特征	源
 第五章 当代的明清词研究 (苑- 缘 (下)	猿
摇摇第一节 苑- 苑年清代前期词的研究	猿
摇摇一、明清之际词的研究	猿
摇摇二、王士禛及其他词人词派的研究	苑
摇摇三、陈维崧和阳羡派的研究	园

摇摇四、朱彝尊和浙西词派的研究	猿愿
摇摇第二节 摇摇员愿圆~ 圆愿圆年纳兰性德词的研究	猿愿
摇摇一、纳兰性德研究概述	猿愿
摇摇二、纳兰性德思想的研究	猿员
摇摇三、纳兰词题材的类型分析	猿源
摇摇四、纳兰词创作特色的总体研究	猿怨
摇摇五、纳兰词“哀感顽艳”词风形成原因的分析	猿园
摇摇六、纳兰性德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猿远
摇摇第三节 摇摇员愿圆~ 圆愿圆年清代中晚期词的研究	猿愿
摇摇一、厉鹗、郑燮及其他中期词人词派的研究	猿愿
摇摇二、张惠言与常州词派的研究	猿缘
摇摇三、晚清词的宏观研究	猿员
摇摇四、龚自珍、蒋春霖、文廷式的研究	猿愿
摇摇五、“清末四大词人”的研究	猿怨
摇摇六、清代女性词的研究	源范
摇摇第四节 摇摇员愿圆~ 圆愿圆年我国港台及海外的清词研究	源员
摇摇一、我国港台及海外清词研究概述	源员
摇摇二、陈维崧和朱彝尊的研究	源远
摇摇三、纳兰性德的研究	源园
摇摇四、厉鹗和郑燮的研究	源怨
摇摇五、清代女性词的研究	源源
摇摇六、饶宗颐 and 叶嘉莹的清词研究	源愿
摇摇第五节 摇摇圆愿圆~ 圆愿圆年明清词研究的新趋向	源猿
摇摇一、明词研究成为词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源猿
摇摇二、祖国大陆清词研究又结新硕果	源远
摇摇三、我国港台清词研究的新成就	源缘
结 束 语	源怨
主要参考书目	源源
后摇摇记	源怨

第一章

明代的研究状况 (1582-1588)

关于明词的分期，人们通常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但在具体断限的划分上不是很明确。张仲谋《明词史》根据明代社会特点、文化背景之转换以及词体自身的发展、词坛名家的相对集中诸因素，把近三百年的明词划分为序幕（洪武）、衰弊（永乐、成化）、中兴（弘治、嘉靖）、衰变（隆庆至崇祯）四个时期。^①但词史并不等于词的研究史，亦不等于词学思想史，李康化以嘉靖三年（1522）杨慎被贬云南为断限，将明代词学思想发展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原因是嘉靖三年（1522）以后在词人、词选、词评三个方面均远迈前期。^②从词学研究史的角度而言，李康化的分析有其合理之处，为了清晰地叙述和勾勒明人对于“当代”创作的批评和研究状况，笔者将把研究的视点放在嘉靖以后的1522年，考察这一时期明代的学者对“当代”词的认识和评价。

① 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58-159页。

② 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 1985年版，第 2-3页。

第一节 摇前期的研究摇 (1522~1598)

这里的“前期”，是指洪武至弘治的 1522 年，这一时期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元末明初的繁荣到明初后期的衰落，比较有成就的词人主要是洪武年间的刘基、杨基、高启，以及享年较长、历经四朝的瞿佑和天顺、成化年间的马洪。因为南北曲的盛行及统治者对戏曲艺术的大力提倡，词的衰落已是大势所趋，词学批评几乎无人问津。笔者通过翻检明代文献，所获词学批评文献主要有刘崧的《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孙大雅的《天籁集序》、叶蕃的《写情集序》、马洪的《花影集自序》、陈敏政的《乐府遗音序》、叶盛的《书草堂诗余后》、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近代词曲》等，这为数不多的几篇论词文字，开启了明代词学批评的先声，也揭开了明词“当代批评”的序幕。

洪武初年，尽管明王朝已经建立，但文风依然沿袭元末。这时文网尚未全张，许多由元入明的文人，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词的创作与批评也沿袭着元末的风气，有的继续张扬元末文人的野逸情趣，如洪武十年（1522），孙大雅为元代著名曲家白朴词集《天籁集》作序，称赞白朴：“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诗词篇翰，在在有之。”有的则继续高扬元末文人的个性解放精神，如刘崧为刘尚宾《东溪词稿》作序，高度颂扬了刘尚宾《东溪词稿》中所呈现出来的张扬个性的内在情思：“其闲清适如空山道者，其风流疏俊如金陵子陵；其闲情幽怨如放臣弃妇，色惨意庄；其述怀抚事如旧京老人，感今道旧，语咽欲泣，亦何能言哉！皆稼轩《送春》一词，沉痛忠愤，悲恸千古，至今读之，使人毛发寒竖，泪落胸臆，真悲歌慷慨之雄士哉！”（《槎翁文集》卷八）

叶蕃（生卒年不详）的《写情集序》，撰于洪武十三年（1524），是这一时期极为重要的一篇批评文字。《写情集》为刘基（1311~1375）的词集名，作者撰序时刘基已经去世五年，相互之

间不存在褒美之嫌了。序谓：

先生（刘基）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其经济之大，则垂诸《郁离子》；其诗文之盛，则播为《覆瓿集》；风流文采英余，《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

根据序文可知，与《郁离子》、《覆瓿集》一样，《写情集》作于元末战乱之际。叶蕃认为刘基生在元末，有经世之志，但才能始终得不到发挥，故借诗、文、词来抒发其抑郁不平之气，他的词与诗、文、寓言等文体一样，都是作者内在情感意志的外在呈现。“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基的创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打破了词与诗、文之间的文体界限，在五代、宋初人们是严格区分诗词文体功能的，即诗言志，词抒情，到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诗、词、文的文体界限才逐渐缩小，刘基生当宋元之后，承袭的正是这一创作趋向；二是刘基还继承了南宋以来“比兴寄托”的审美观念，从《写情集》的表层看，它写的是“四时景物”、“风月情怀”，其实是要借以抒写其“忧世拯民之心”。这一分析是符合刘基创作之实际的，如其传世名篇《水龙吟》（鸡鸣风雨潇潇）即以王粲作客他乡、登楼作赋自比，在写景中表达了他对昏浊时代的忧虑关切之意，也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另外，叶蕃还总括了刘基词在艺术创作上的主要特点，这就是“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也就是说刘基词在风格上是多样化的，有的婉约，有的豪放，这也大致概括了刘基为词之特点，沈雄《古今词话》引《乐府纪闻》云：“（刘基）其词虽婉丽，而有感慨之句”。

陈敏政（生卒年不详）的《乐府遗音序》是评论明初另一位重要词人瞿佑的，瞿佑（1481~1534）是一位享年较长，受元末

著名诗人杨维桢褒奖，与凌云翰、杨复初等交往密切的词人。他先后写有《余清词》、《乐府遗音》等，《余清词》今不传，《乐府遗音》非纯粹的词集，该集凡五卷，卷一、卷二为古乐府，卷三以后则为词，最后还有“北曲”~~阙首~~。序谓：

乡先达存斋瞿先生，自少英敏，负隼才，无书不览，靡学不通，而尤长于诗词，通音律，其所作乐府，皆可咏可歌，爱之。……（敏政）乃伏而读之（指《乐府遗音》），则见其五七言古近体可与唐之储、王诸作者并驾，而长短句、南北词直与宋之苏、辛诸名公齐驱。非独词调高古，而其间寓意讽刺，所以劝善而惩恶者，又往往得古诗人之遗意焉。

这里有三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说瞿佑通音律，所作乐府可咏可歌，这是讲词乃一种具有音乐性的文学体裁，也就是说瞿佑填词很重视词的音乐性；二是说瞿佑的长短句和南北曲与苏轼、辛弃疾并驾齐驱，有学者认为陈敏政这是讲的外行话，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它实际上是谈瞿佑革新词体的贡献，苏轼以诗为词给词体进行了第一次革新，辛弃疾以文为词为词体进行了第二次革新，瞿佑则是以以曲为词的方式对词体进行了第三次革新，瞿佑的《乐府遗音》把古乐府、词、曲混为一编，就是要消除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陈敏政对瞿佑的这种做法是持赞同态度的；三是说瞿佑的词“寓意讽刺”，“得古诗人之遗意”，是说瞿佑词遵循着“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这一看法也当是符合瞿佑文学思想的确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过：“瞿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俚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同时又说这些创作：“虽属情妖丽，游戏翰墨之间，而劝百讽一，间有可采。”（卷十二）

王昶说：“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不乖于风雅。及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明词综序》）一方面是宋元词籍的大量失传，明人填词无所依凭，另一方面是统治者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推行程

朱理学，查禁“褻读帝王之词曲”^①，一般文人承袭了自宋以来流行的“小词有损大节”的观念，皆弃置小词而不顾，更不用说进行创作了。据叶盛的《书草堂诗余后》（《竹堂稿》卷八）记载，他幼时初读《草堂诗余》而“手之不置”，便遭到其叔父大声呵斥，力劝其读仁孝劝善之书，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词曲的鄙视态度，词在这时走向衰落之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当时依然有少数作者偶尔涉笔于词，如王直、聂大年、吴宽、史鉴的词，通常为现今的明词选本所辑录，其中马洪是一位专力为词且写作态度极为严谨的布衣词人，马洪的《花影集自序》亦是明初词坛一篇很重要的词学论文。此文虽为自序，重在表述作者自己的写作观点，亦可由之洞悉作者创作之路径。序谓：

予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缘是求二公词而读之，下笔略知蹊径。然四十余年，仅得百篇，亦不可谓不难矣。法云道人尝劝山谷作小词，山谷云：“空中语耳！”予欲以“空中语”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称《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

马洪是从学习苏轼、柳永两家词入手的，他自称“四十年间，仅得百篇”，未免有些自诩，但也可知其写作态度的严肃，特别是后一句更说明马洪创作是以艺术真实为真实，而非以生活真实为真实，所写之词有的还表现了深沉的生活感慨。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瞿宗吉曾赋诗《漫兴》、《书生叹》，盖有“感时伤事”之意，马洪感其诗而作《画堂春》词：“萧条书剑困埃尘，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涧背阳春，勉强精神。且可逢场作戏，宁须对

① 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6 页。

客言贫。后来知我岂无人，莫谩占巾。”词中便表达了他的“牢落”不偶之感，也是因对现实不满而发出的不平之声。

第二节 摇后期的研究（1500—1600）

一、后期词学批评的发展

这里的后期是指1500年到1600年的100年时间。弘治以后，明词由前一时期的衰落转而有复兴的迹象，涌现出杨慎、陈霆、陈铎、张林、夏言等在明代词坛上甚有影响的词人。不过词学批评要晚于创作一步，当时较有影响的两部词话，《渚山堂词话》（陈霆）成稿于嘉靖九年庚寅（1530），《词品》（杨慎）成稿于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据有的学者统计，大量有理论价值的明代词集序跋皆作于嘉靖以后，以嘉靖年间作为后期词学发展的起点当是比较合理的。^①

后期词学的发展以创作的复兴为前提，从事倚声填词的作者数量多少，是衡量一个时期创作繁荣与否的量化标志。李康化将赵尊岳《明词汇刊》收录的100家词作者，进行了一个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前期1500年，词人仅有100位，后期1600年，词人多达1000位，也就是说嘉靖以后从事词的创作者是越来越多，更为突出的一点是这一时期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大批女性词人，有的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依托的女性创作群体。赵尊岳说：“女史词在宋之李清照、朱淑真大家，昭昭在人耳目。元代即不多，《林下词选》，几难备其家数。而明代订律拈词，闺赀彤史，多至数百人，《众香》一集，甄录均详。”^②明末王端淑编《名媛诗归初编诗余集》，选明代女词人100家；清初周铭编《林下词选》，选明代女词人100家；清中叶王昶编《明词综》，选明代女词人已至100家；近代吴灏编《历代名媛词选》，选明代女词人多达100家。与创作繁

① 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0页。

② 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大公报》副刊1932年10月10日。

荣相联系的是词籍专集越来越多，在明初除刘基的《写情集》、高启的《扣舷集》和瞿佑的《乐府遗音》外，大多数作者的词作是附于诗集之后的，而在嘉靖以后词集单独编辑渐成通例，像王九思的《碧山诗余》、夏言的《桂洲集》、杨慎的《升庵长短句》、张林的《南湖诗余》、施绍莘的《秋水庵花影词》等皆是，这一方面说明词的地位在逐渐提高，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作者创作数量之多，没有多达百篇左右的作品是无法结集成编的。这一时期编辑的词选亦注意采录明词，像《词的》（茅映选）、《词林万选》（杨慎选）、《古今词统》（卓人月编）、《词菁》（陆云龙编选）、《古今诗余醉》（潘游龙编选）、《诗余广选》（卓人月编选）、《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沈际飞汇编），皆选有明词。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编选了第一部明代词选的专集——《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钱允治编、陈仁锡释）。该书成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574），凡五卷，收词人 100 家及无名氏词作共计 1500 首，结构上依词调字数多少排列卷次。从书中所收词人看，明初惟刘基一人，主要为中期词人如唐寅、文征明、王世贞、杨慎等，像杨基、高启、陈霆、陈铎、张林、马洪等人词一首未选，可见作者所见不广，所选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张仲谋认为此书有两大弊端，一是大量的散曲作品误作词收入，二是词调名不规范，不统一。这是中肯的评价。但是，它作为迄今所见第一本明词选，其意义却是不可抹杀的，正如赵尊岳所说：“明人选明词，本不多见，亦足珍梦也。”^①

如果说作者人数的增多，词籍出版力度的加大，是后期词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的话，那么理论的自觉则是后期词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其表现就是在嘉靖以后人们积极地反思前一时期创作存在的缺失。陈霆说：“予尝妄谓我朝文人才士，鲜工南词。间有作者，病其赋情遣思，殊乏圆妙，甚则音律失谐，又甚则语句尘俗，求所谓清楚流丽，绮靡蕴藉，不多见也。”（《渚山堂词话》卷三）这里指出明词之弊有三点，一是浅率直露，二是音律混乱，三是语辞俚俗。陈霆所说的是明初词坛的情况，嘉靖以后词界由衰

① 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22 页。

敝转为中兴，创作上亦呈向两宋传统复归的趋势。但当时的批评者，在对嘉靖以后词坛创作业绩的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一种倾向是认为明词已恢复宋代的传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应该肯定。如王兆云说：“李空同，文章巨手，不屑小制。……陈大声不但善北曲，乃和宋诗余等篇，大有佳者。……尝谓宋人敝神此体，深入要眇，自元以还，声律渐远，明兴，间有作者，益不类矣。间尝稍为編集，其中陈大声铎、王浚川廷相、张南湖林、夏桂洲言、杨升庵慎为多，而夏颇称胜。”（《挥麈诗话》）这还只是肯定了明代中叶的词，而钱允治不仅认为明代中叶的词恢复了宋代的传统，而且还认为它在成就上有超过宋代的趋势。“国初诸老，犁眉、龙门，尚沿宋季风流，体制不谬。……正嘉而后，稍稍复旧，而弇州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辨。……嗟乎！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而我朝监于二代，郁郁之文，炳焕宇内。即填词小技，遂出宋元而上，几欲篡其位，兹非国家文运之隆，人才之盛，何以致是哉！”（《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另一种倾向是将明词与宋词比较，认为明词远不及宋词之成就，如王世贞说：“我明以词名家者，刘诚意伯温，纤有致，去宋尚隔一尘。杨状元用修，好入六朝丽事，似近而远。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艺苑卮言》）陈子龙说：“本朝以词名者，如刘伯温、杨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长，大都不能及宋人。”（《王介人诗余序》）郑以伟也说：“我明作者，如青田始开其奥，时艺既专，情为理掩，才与趣违。而烂熟之程式，终不尽关蕴藉之手，于是藻曲填塞，亦不免词兴诗亡之讥。”（《灵山藏诗余自序》）文人“才”“情”既失，创作兴趣转移，明词成就不及宋词亦理所当然。

平心而论，从词史发展的角度言，明词无疑是千年词史的“中衰期”。但是“中衰”并不等于“消亡”，况且明词从嘉靖以后逐步走出低谷，应该说上述两种说法中的前一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后一种说法指出明词不及宋人亦是事实，问题的关键是，何以明词“中衰”而不及宋人？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词乐的失传，李染说：“北曲起，而诗余渐不逮前，其在于今，则益泯泯也。盖士